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 三民主義周刊

第一卷 第十九期

## 本期目次

整飭吏治運動發端(上)

張匯文

與青年論政治

李俊龍

論民主集權

高傳珠

價值觀念的顛倒

李長之

小烹集

紹虞

定價每冊一角 半年二元五角

經售處各大書店

編者及發行 三民主義週刊社

重慶春森路三十號

書目單據史料徵輯會

# 整飭吏治運動發端 (上)

張匯文

總裁於當前建國要務與五權制度實施之要領講詞中曾說：「各位文武負責同志，人人都要深切反省，認識我們一切軍事政治缺乏成效，力量不能發揮出來，就是因為人事辦理不完善，或是沒有完善的法規和制度，或是有了而不能執行，不能運用；應該對症下藥，急圖補救。」張先生這篇大作就是針對着 總裁這個提示，對於吏治問題提供出一個具體的補救方案。

張先生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他認為當前吏治問題的關鍵，不在研究現有的制度是否健全，而在怎樣樹立一種足以推進吏治改革的力量；有了這種力量，就不難演生一個完善的人事制度來。對於這種力量的培植和形成，張先生不但根據健全的理論，提出許多新穎的意見，並且引證英美德三國吏治改革的經驗，作我們的參攷。此外，他認為吏治的整飭應當作一種社會運動來發動，尤其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建議，可惜本刊篇幅有限，不得不將這篇大作分兩期發表；這是編者對張先生及讀者所極抱歉的。

編者

## 歷史的教訓

吏治的良窳，足以影響一國的興亡。先哲有言：「國家之收，由官邪也。」又說：「上交往利，而國危矣。」這幾句話，絕非空泛的理論，實乃經驗的史實。

諸葛亮看了兩漢的興衰，下了一個結論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前後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李白成看見明朝將亡，劉切為民請命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煇蔽者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有閉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公侯皆食肉執袴，而依為心腹；官官皆蔽體犬豚，而借其耳目。羈囚繫繫，士無報禮之心；征伐重重，民有倍亡之恨。」可見明朝的亡，並非由於缺乏民族英雄，實乃亡於吏治腐敗。

漢清中葉，外有英法侵攻，內有洪楊之亂。當時局勢的嚴重，不減於今日，曾國藩對於當時局勢的分析認為喪亂的主因，是由於吏治頹敗，而挽救

危局之道，惟有從整飭吏治作起。他嘗說：「唯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毫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偽，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歐羅天意人事，大局殆無挽回之理。」（書札卷七）他又說：「今春以來，粵匪（洪楊）益復猖獗，西盡涇鎮，東極平橋，二千里中，幾盡一尺淨土，推本尋源，何嘗不以有司庸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洩於上，一切廢置而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書札卷一）對於國家中興之道，他認為「在乎得人而不在乎得地。」他說：

「鄙意以為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選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懷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關關世變，但覺除得人外，無一事可好。」（書札卷七，覆方子白書）

這一段剴切沉痛的議論，吾人今日讀了，能不感慨系之！

總之，歷代的衰亡，無論死於外敵或女禍，宦官或權臣，一言以蔽之，都可以說是由於吏治不振。反之，大凡一國最盛強的時候，也必是吏治最清明的時候，隋文帝開皇之治，可說是以勤儉良吏而造成，宋初開初之所以強盛，也由於吏治比較清明，而吏治之所以比較清明，大半是因為「官吏犯職，遇赦不原。」「重繩貪吏，置之嚴典。」史實累累，中外古今，如出一轍，吾人無須一一贅述。

### 整飭吏治的目的

說到整飭吏治，本有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問題。在積極方面，整飭吏治的目的是在確立一種現代化的人事行政制度。在這個制度中，我們希望：一、使人有同樣的機會可以參加政府為國家服務，而真能在政府內工作的人員確是社會上最有才能的人士；二、使官不備能，人盡其才，和「才盡其用」，而且能「各盡其職」和「各安其職」。在這種希望中，我們不僅要保障人員與人的機會均等和官與官的公平待遇，而且要去謀「人」與「事」的適當關係，因為只有從「人」與「事」的適當關係中，才可以得到人的最大功能 and 事的最大效率，然後才可造成現代國家所迫切要求的「有能的政府」。

這種人事制度的理想，就是近代西洋各國所努力造成的「文官制度」，也就是國父中山先生提倡考試制度的最終目的。不過，我們要想樹立這樣理想的一種人事制度，首要的條件必先排除阻止這種制度樹立與推行的一切障礙。具體的說，惟其要保障人人有參加政府為國服務之平等機會，所以我們必需杜絕一切俸進不平的任用門徑；惟其要有才能的官吏能各盡其才，各盡其職和安其職，所以我們必須淘汰政府中的一切俸進不良份子和澈底禁絕一切貪污不行為。這就說，整飭吏治的成功，必須積極消極雙管齊下，而在吏治整飭的初階段中，排除障礙似乎比建設制度更見重要。

就性質上分析，人事制度乃是一個行政專門問題，而排除障礙的工作則屬於「治」範圍。不過，目前的吏治問題，還不能將它當作一個「行政」問題去看待，因為至今全國人對於政治與行政的區別尚未認清，在行政改革的道路上，處處遇到「治」的阻礙。最近蔣委員長在講「三制」的演講中，特別提出了「治」與「行」的區別來，他說：「國人往往爭『政治』」

「行政」來看，又拿「行政」當作「政治」來看，因之「行政」與「政治」的性質，往往混為一談，這是最大的錯誤。」因此，為使吏治問題能早日達到「行政」的領域裏去，我們必須早日使其由「政治」的魔手中解脫出來。

### 當前問題的藏結

這多年來，我們不時聽到「行政改革」的呼籲，政府方面對於這個問題也十分注意，無論在消極方面或積極方面都盡了很大的努力。根據中山先生五權憲法原理，我們首先成立了五院制度；監察與考試兩院的目的，都是為了要造成一個廉潔有能的人事制度，前者的性質是在積極的防範和制裁，後者的性質是在積極的建設。此外在政府方面，為着共同的目的，還有先後成立的超然主計制度行政法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和行政效率委員會等組織；在黨的方面，本來即有監察委員會的存在，最近又有黨的工作改組委員會的設置，在軍事委員會的系統下，又有其工作的性質去劃分，却都不能超出整飭吏治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範圍。我們再進而研究與這些工作有關的法，從政試行的法令起，到懲治貪污的條例止，為數總在百種以上，單從法律的內容上去分析，也不能說不周密，不詳盡了。然而我們要問，為什麼行政效率不見提高？貪污的事實仍極普遍？難道真如外人譏我之言：「中國人秉性是貪污」麼？

貪污的成因本極複雜：經濟狀況，政治制度，教育程度，個人心理，社會背景，風俗習慣，甚至家庭制度等都可以構成貪污的因素；而在中國，貪污的構成，可說與這一切問題都有連帶關係。從另一方面來看，貪污的事實不但極複雜，而且也很普遍，我們雖不能說，凡有一府必有貪污，但我們似乎可以說，幾無一府能以絕對廉潔。換句話說，貪污的事，各處都有，並非吾國所獨有。不過，中外國家雖同有貪污的事實存在，雖同有過剩除貪污的努力，然在揭發貪污和制裁貪污方面，則有極大的差別。在外國，猶其在英美，治比較已上正軌的民主國家裏，貪污的事實是比較容易發現，而在發現之後，就絕對要受法律的嚴懲；假使負責懲戒的機關若問，則必受

歐美上稱與論上的嚴格限制。同時，在這些國家裏，無論人民或政府機關，都有會發和檢舉貪污吏的勇氣，法律與輿論也都有嚴格制裁的力量，所以，無怪乎貪污的官吏日見減少，行政效率日見提高。在中國的情形則大不相同，貪污的事實雖極其普遍，但最難揭發，即使有偶然的發現，也很少受其公開；縱然不得已的公開，又很少能說事師的加以應有的懲戒和制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好像覺得：受懲戒的總是例外與不幸，在這種心理狀態支配下，也無怪貪污無法肅清，行政效率不易提高！

平心而論，這種嚴重局勢的形成，自必有其基本原因。過去國人對於貪污問題的討論，多半着重在原因的析，希望澄清貪污的原因以後，就可以「肅正下藥」，去謀清源之道。這自然是一種很合理的方式。不過，依我看，到了今天，這個問題的重心，已不是一個探求病源和對症下藥的問題，而是下藥無效將怎麼其生效的問題。在現階段中，「追究病源」，固然仍有必要，然而「求藥生力」更是當務之急。我們現在所要問的問題是：何以別國的整飭吏治工作，無論在積極或消極方面，都發生最大的效果？而在吾國，雖則用同樣的劑度，同樣的合法和同樣的方法，却不能發生同樣的效果呢？我們絕不相信，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領袖沒有整飭吏治的決心和誠意，但我們絕不相信，在我們整飭吏治的工作中必有許多基本的缺陷。這些缺陷，在我看來就是：

- 第一，我們過去的工作，無論在積極或消極方面，都缺少一種中心推動力量；
- 第二，我們過去的工作，無論在政府或民衆方面，都缺少一種有組織的合作；
- 第三，我們對於吏治整飭工作，至今未將它當作一種社會運動，而只過於偏重在：府本身去改良自己，未能發動個人去改良社會。

### 改革運動的方式

翻閱歷史一看，人類間無論那種事業的興革或制度的確立，沒有不靠一種中心推動力為其成功的條件。這種中心力量的構成，不外下列幾種不同

的類型：

第一種形式是以一個人為中心，藉其在某方面的成功，取得了社會的權威和領導地位，更藉此權威和地位，對國家社會作激進的改革與建設，古代賢明的帝王和近代的革命家或大政治家，都很好的例子。

第二種形式是以少數人為主幹，他們都是對於某一種事實的興革有着專攻的熱誠，不惜犧牲畢生的時間和精力為着這種興革的成功而努力，他們能任勞任怨和以身作則，從實際工作中取得社會的信仰，中外古今的社會改革家多半都走這一條路。

第三種形式也是以比較少數人為核心，惟這級人本身即為某種事業改革的對象，他們自身也感覺到改革的必要，所以才自動的組織起來從內部努力改進，以求適合於社會的要求。

第四種形式是利用比較廣泛的民衆組織，在民衆間造成一種相當普遍的力氣，更藉此力氣，迫使負責當局實施某種改革。但這些組織，未必具備一定的形式，既可利用社會上原有的組織，也可以特別組織新的團體，總不外乎仁實與論以推進改革。

以上四種形式雖各不相同，却可並行不停。任何事業的興革，至少必有一種為其推動的主力，如果四種力量能同時合作，自然更易成功。我們放棄各先進國家吏治改進的沿革，可明顯地看出他們的主力所在。今以德英法三國為例，以供參考：

### 德國的先例

德國之官制度的樹立，可以代表前述所提的第一種方式，就是說，確本制度的主力是「個人」，賴「人治」而創立了「法治」的基礎。在十七世紀以前，德國尚無「吏治」可言，其近代文官制度的基礎是樹立於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的三十年戰爭之後。樹立這個基礎的人是腓特威廉，完成這個制度的是他的長孫腓特大帝。三十年戰爭的結果，使德意志到了精疲力竭民窮財盡的程度，當時外侮雖已不足畏，而內部却有許多嚴重問題；因為德意志帝國時還是一個聯合王國，領土散漫，割據的局面依舊存在，因為一般精神

「歐洲，政治異常敗壞；又因為政令不得普及推行，稅收不頗豐。」對於選舉，「應使兩方面取得這種狀況，便下了動輔治的決心。他因為更換教區過重入手，先組織了常備軍，一在「建軍」，一在「建官」。在建軍方面，他從英國的「建軍」計劃。在建官方面，他開始從整飾而官和確立官規作起，對於官吏的任用，徹底掃除了過去的援引惡習，而代之以客觀的標準；在行政方面，他劃分分工，注重責任，實行考核，並創行了行以合職制度。凡此種種，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雖未能盡合近代文官制度的標準，却為普魯士奠定了一個健全的吏治行政基礎。腓特大帝本着他祖父的精神，或所承受下來的遺產，而奮而廣大之。他對德國最大的貢獻就是創立了德國的考試制度，使普魯士的行政成為十八世紀世界上最有效的行政。直到今天，德國行政效率之優，以仍能歸於此，誰能否認腓特祖孫二人的勞績！」

「自古時勢造英雄，英雄亦復造時勢。」一個偉大人物的感昭與毅力，有時可以決定一個民族幾千百年的命運。腓特祖孫二人之所以能做到「制國千古」，「留芳百世」，並沒有深奧的祕訣存在，不過他們地定了一個「辦法必行」和「說到做到」的決心而已。吾人固無須乎因此而太鼓勵「人治」，然而我們却應當承認，合理的「人治」可以奠定「法治」的基礎。

### 英國的先例

英國的文官制度可說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了。但是我們一瞥它的沿革，以知道它之所以有今日，也是經過數十年艱苦奮鬥的結果。不過，它推動吏治改革的王力不是「個人」，而是「兩部份人」：

一、是那些相信考試制度的人，他們是為主張而奮鬥。

二、是政府的官吏為了自尊心，責任心，和自我利益的而努力。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英國尚無所謂近代的文官制度。由於十八世紀內閣的結果，國家的任官通無形中由國王手裏轉移到國會議員手裏。當時的官吏，多半都「由議員們分別保薦自己的親朋好友去充當，而人們對於增加自己在國會內的勢力起見，也不管以官吏位置虛收買。

是，國會變為了投票的代價，結果是政府各機關都充了議員；同時他們也變為特種貴族的子弟，既無能力又向浮華，政府的效能和廉潔都無從談起。此外，還有一種事實存在，就是國會議員可以同時兼任行政官吏，行政官吏也可以兼參加一切政治活動，這使政治和行政更見混淆。

當時之士對於這種混亂的局面，早懷補救之心。遠在一八一〇年，英曾總督威爾遜勳爵為文倡議公開競爭考試任用的意見，後來大文豪加萊爾氏（C. Colclough）也即寫作，對現狀加以評議。他們兩人的努力，在輿論方面發生極大的力量，喚起了許多人的觀感。不過，推動改革運動的主要人物，還不是他們，而為幾個比較不出名的人物。彼德考萊，脫萊爾林，諾爾登特，開文特，賴佛雷和榮得威克等。他們中間有的是政府的官吏，有的是在教育界服務，因為對於考試制度發生了共同的興趣和熱烈的信仰，所以都矢志為實現此目的而努力。未若同僚合作的態度，他們一方面作宣傳的工作，一方面作實際研究的工夫，他們研究所得的報告，終為政府採納。先在印度試行，成績斐然。後來又根據印度的成績，推行於本國。一八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政府在國會議員的熱烈反對中，竟然以樞密院的命令成立了文官考試委員會。從此英國文官制度的基礎才算得到了法律上的根據。

不過，僅僅成立一個文官考試委員會和公佈一些與考試有關的禁令，還不能就算文官制度的成立。因為一個制度成立的条件，必須要它自身有無搖動的權力。英國的財、部在行政上雖然可以借財、控制權運作督督執行官法令的作用，然而在我看來，真正推動英國文官制度的力量，尚不是財、部而是公務員本身對文官制度所發生的信仰。凡多少國英國公務員發生這種信仰的人，都不難發覺他們每個人對於文官法令的推行之切切程度不啻於政府當局。根本上他們認為文官制度的理想是代表一種極高水準的行政，國家有了最高水準的行政，是光榮的，個人置身於這樣的行政裏，尤其光榮。同時他們認為文官制度的成功，就是自身利益的保障，因為文官制度所代表的精神是平等與公道，只有在平等和公道的條件下所得到的利益，才算是有保障的利益。他們這種這種態度去看文官制度，不但不以文官制度的推行為不利於自身，反而認為文官法令的不執行是自身的損失，所以我們在英國文官法令的執行過程中，可以見到公務員不僅在清道方面而能發揚的以教育

在的積弊方面負責監督法律執行之責任。自尊心相責任心時時在驅使「法勞力做一個國王的忠僕」和「模範的公民」。就是在這裹包辦政期中，貴族官吏也未嘗不說了這種心理的支配，一方面，他們爲着自尊，不得不努力爲善，以求合乎文官制度的標準；另一方面，爲着他們在社會上的財產利益，他們也很明白，除非有一個廉潔有能的社會的秩序是無法維持的；而文官制度的使命即在造成一個廉潔有能的社會，所以他們也樂於贊助。純粹以財產爲基礎的官吏階級，受了這種改善的導引，漸漸走入牛津劍橋爲背景的新貴族官吏階級，從儀的方面來講，可謂一大進步。這新貴族式的官吏們，因爲有學術的背景，對於自身榮譽看得更重要，所以對於制度的推行更加努力。二十世紀以來，因爲公

法勞多的變遷，責任的意識加強，英國文官在質力的方面又有向着民主式的面去發展的趨勢，這就是說，對於文官制度的推行，過去所認爲是「府責任」的，現在漸漸認爲是公務員自身的責任，公務員固然站在權利的立場上時時要求參加意見決定一切與文官管理有關的問題，「府也處處鼓勵他們有組織的權量的發表意見。現在英國文官制度中所盛行的「惠特里申威制度」就是本着這「原則」而成立的。自從這「制度」採行以後，英國的文官制度雖然在表面上還未完全脫去新貴族式的外套，而在實質上則已充滿了民主的精神。這種精神的表現，對於整個文官制度的推動，產生極大的動力。總起來說，自從文官制度在英國倡行以來，英國的文官自始至終即處於推動的地位，他們一貫的態度是善意的合作和積極的努力，爲着文官法令的普遍實施，甯願犧牲個人一時的方便。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是值得吾人敬佩的。

### 美國的先例

美國現行的文官制度是根據一八八三年國會通過的彭得爾頓法案而成立的。在一八八三年以前五六十年之間，美國的政治是籠罩在「分贖制度」之下。這「制度」的大意是：凡選舉得到勝利的總統，在就職的時候，必將政府中屬於異黨的官吏全部撤換，將空額分給那些爲選舉活動出力的黨員，以示酬勞。這本是一種「結黨營私」的勾當；不過，在政黨政治的幼稚時期，各政黨爲掩飾自己的分贖事實，反而造出種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來替自己辯護，

而社會上有許多人竟然被這種理論所蒙蔽而信以爲真。他們的理由是：第一，「做官是人民的權利」，而「輪流做官」是合乎民主治的精神。第二，他們認爲，「黨的力量全賴黨員對於黨的活動能熱烈參加，以官職爲酬答」，是吸引黨員參加活動的有效辦法，既合乎「論功行賞」的原則，又可以鞏固黨在政府中的地位。對於這種理論，當時的各黨無不認爲之當然，而奉爲圭臬。一八二八年普克遜氏獲選爲總統，他雖然根據這種理論在國會中公然的倡導「分贖制度」。從此以後，分贖的事實成爲「制度化」，「權力」和「貪污」結下了不解之緣。因此，美國的吏治「江河日下」，而貪污之風，如「火之燎原」，無法制止，終於造成了美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半個世紀之黑暗時代。

五十年前的黑暗政治，並沒有掩蓋了改革家的眼光，更未能抑制住政治家們的勇氣。普克遜就任不到兩年，參議員巴登氏便開始對「分贖制度」作公開的抨擊；嗣後數十年內在參眾兩院中又不斷的可以聽到攻擊分贖制度的言論和要求吏治改革的呼聲。但是，這些無組織的呼聲，對於一個以政黨爲後盾的惡勢力，畢竟是無可奈何。可是正當分贖制度方興未艾惡焰萬丈之時，英國的吏治改革運動宣告成功。這件事給許多美國有心人一個新的刺激。而欲試制度在印度試行的成功，更給許多美國改革家一個方法上的參考。大改革家鄧克斯對於放試制度隨即開始作有系統的研究，除了英國和普魯士的制度以外，他更特別的研究過我們中國的制度。從一八五一年起十餘年內，改革家在議會中關於行政改革曾提出不少的議案，但因爲同情改革的人數太少，大多數的議案都未能通過；而那些少數被通過的議案，又多是關於局部的改革，到了執行的時候，因爲政府沒有誠心，也多半成爲具文。

舊勢力雖然不易剷除，但新潮流也斷不可遏止，改革家的提來雖不足以撲滅分贖制度的火焰，然而這不斷的努力，却已夠引起人民對於行政改革的注意。同時，分贖制度的這點，經過了數十年的表演上已露露無遺。它的理論根據，不但在人民中間失掉信仰，就是黨內明達之士，也漸漸的認清「輪流做官」不是一種妥當的辦法。它既不能造成一個廉潔有能的政府，更無法保持一個團結一致的政黨，因爲改革黨官既成風氣，黨內的衝突競爭就在所難免，長此以往，黨與個人也都喪失去人民的信仰。林肯總統有鑒及此

在一八六五年，便抱着大無畏的精神，給了分黨制度第一次的正面打擊。儘管然決然拒絕了政客們的一切要求。這件事對林肯個人正當的關係上雖有相當的損失，但對於國家則發生了轉移風氣的作用，吏治改革也可以說從他以後換了一個新的面目。這可從三方面去看出來：第一，黨林肯而起的幾個總統像格蘭特、赫爾斯和格爾菲等公認表小同情改革，甚而實行改革。第二，改革漸漸同政府中的賢明當局取得聯絡，從此議會中的改革運動和政府的實際改革漸漸着改革家的內外呼應而取得合作。一八七一年，由於葛羅斯等屢次提議實行改試制度的結果，議會通過一個法案授予總統以法令令領吏治之權，以謀行效率的提高。根據這個法案，格蘭特總統就任命了一個吏治研究委員會，更聘改革家克勞斯為主席。在赫爾斯總統任內，這種運路益見明顯，他一方面派改革家伊頓赴英國考察吏治，一方面又委改革家舒爾利為內政部長實行小規模的考試制度，這些工作後來對於吏治的改進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三，政黨領袖們也漸漸看出吏治改革已成爲不可抑止的要求，爲維持黨在民衆間的地位起見，不得不以吏治改革列爲競選的條件，所以自一八六八年起，民主黨首先將吏治改革列入政綱，四年後共和黨也作同樣的主張，這不能不算政黨政治對改革運動的第一次的屈膝。

政黨將吏治改革列入政綱，誰都知道那是「自欺欺人」騙取選票的把戲。不過這番表示，至少給了改革家一個新的提醒，就是他們從此理會到，真正可以推動黨走上改革的路上去的力量，決不是他們的提案和研究計劃，而是選民的投票。他們因此運想到過去失敗的最大原因，也是因爲沒有直接向人民方面多用工大。爲補救過去的錯誤而增加改革的力量起見，他們決定變更努力的方向，從事喚起民衆和組織團體。一八七七年他們在紐約首先成立了一個吏治改進協會，參加的人多是社會上的中等階級和知識份子，選出拜蒙士敦爲會長，伊頓爲執行委員會主席。他們的工作爲：宣傳，研究和督促政府實行改革。一八八八年該會改組，改選克羅斯爲會長，葛爾菲爲執行委員會主席，從此工作更見積極，會員從百餘人增加到五百八十三人，包括十三州人民。自紐約協會成立後，全國各大城市的人民無不聞風而起，相繼組織成立同樣的團體，不到兩年的工夫，全美已有二十多個規模很大的團體，參加的分子在萬人以上。一八八一年全國體選派代表在羅伯特城開會成立

了一個改進吏治全國同盟。從此吏治改革以此會爲中心成爲全國普遍的運動，各地的分會都認本著共同的目的和計劃推進會務。其工作範圍，除了對行政改革和考試制度作有系統的研究外，最普遍的有：作各種教育演講；在報紙雜誌上作各種宣傳文字；刊印種種叢書和宣傳小冊；設論文獎金鼓勵學生作論文演說比賽；向各級政府作計劃的行政改革建議並督促其實現；調查行政實況並以會的名義發覺貪污，向政府作種種諷刺行動；還有每到選舉前夕必派代表訪問各候選人使其明白表示對於改進吏治的態度和意見，然後組織選民作有計劃的投票。這一類工作，積少成多，普及全國，形成了吏治改革的推動力量。

正當各種工作風起雲湧長足進展的時候，國內忽然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就是格羅佛爾總統在就職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因爲拒絕「分黨」，被一個失望的青年刺死。這一粒不祥的槍彈，雖然結束了格羅佛爾總統的性命，可是燃着了全國上下對於分黨制度的怒潮。正當輿論沸騰達於極點之際，改革家們看出時機已到，不可錯過，於是發動全國，集中目標一致擁護當時正在議會討論中的彭爾頓改革法案。這個法案的內容是出於改革家伊頓和克勞斯等的手筆，經參議員彭爾頓提出議案，在最初提出來的時候，政客們還想作「困難之門」，表示反對，到了總統後被案發生，全國輿論中，吏治改進已成了不可阻止之要求，於是兩院先後通過彭氏法案。美國的吏治從此邁進於光明繁榮的大道。

從以上的敘述看來，在美國創立文官制度的過程中，改革家所遇到的困難是比任何國家的都艱鉅，其原因就是因爲吏治的腐敗在美國先形成了一種有組織的力量，這個力量打着民主政治的招牌，借着政黨的組織，得以欺騙人民，魚肉人民。在改革運動的演變中，我們又可以看出，改革家對於政府當局去苦口婆心的規勸，和繼續不斷的去提方案，雖則可以感化一二開明的官長，而不足以推翻一個「制度」的惡勢力。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有用組織的民衆力量，才可以剷除一個有組織的官僚階級，只有拿出民主政治的真牌子來，才可以打倒假牌牌的民主政治。這種改革的方式，就我們在前邊所提出的第四種方式。







完善的建立。許多政治上的缺點，我們無庸認為必不可避免的。譬如政治經濟的重複龐大，政治運用的停滯迂緩，政治宣傳的僥倖苟且，以及政治風氣的未能澈底澄清，政治道德的未能普遍培養，這一切的一切，我們幾乎隨在可以找到證據，如果我們要尋求政治的進步，對於這些政治上的缺點，當然需要嚴厲的批評，一個革命政治家的態度，就應該坦白的認錯，勇敢的改錯，過去官僚政治的敷衍，推諉，粉飾的惡習，當然為今日革命政府所不容。所以我們對於現實政治的批評，只要能從上述的態度與方法之下，我們願意號召全國青年共同努力培養嚴正的政治批評風氣！所有嚴正的批評，才可以防止奢侈的浪費，亦惟有嚴正的批評，才能造成真正的輿論！

於此，我還要提出一點意見：目前青年們有一個普遍的缺點，對實際政治的理解不夠，一涉批評，或察的過高而流於空想，或輾引歐美政治事例以責備當局，這種動機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我們為提高政治批評的影響，不能不要求所有青年認現實的政治環境和治療條件，對實際政治作更進一步的研究，然後所有批評才能搔着癢處，所有主張才會被人重視而不致為書生之見了！

最後我還想略談青年的政治修養問題。凡是和實際政治接觸較久的人，大抵都有「治幹部缺乏的感覺，「寫字之本在人」，如果我們要想進行革命政治建設，就非培養大批的政治幹部不可，因此，我們認為對於青年的政治修養問題，特別值得重視。

首先，我們要指出政治道德的修養為青年一切政治修養的根本，如果沒有政治道德，縱有一治能力，反足以為害國家民族。試看歷史上許多亂臣賊子，亦未嘗沒有一些本領，但其存心不正，則所謂本領也者，小之毀法亂紀，權傾五霸，大之禍國殃民，造成萬世千秋的罪惡。即以現在受敵寇卵翼的漢奸人物而論，其中亦未嘗無具些才幹的人，然而他們昧于做人的大義，甘心叛國從賊，那末，他們縱有些本領，也不過替敵人做殘殺同胞的鷹犬而已！我們鑒往知今，不能不大聲疾呼的喚起青年們注意政治道德的陶冶，青年們必須具備「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節操，具備「有所不為而後可與有為」的政治素養，然後始能為一個堂堂正正的近代政治家，始能「隨事不懼」和「臨難不苟」，做一個能議大體明大義完大節的革命幹部。這種工夫，決不是心裏想想嘴說說和筆下寫寫便可以做到的，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長時間的磨練。這種風氣，是中國今日政治上最需要培植和

獎勵的，也是我們青年們所最應該講究的。無論從中外歷史上去看，一個民族的復興，必須要無數忠貞不撓之士作政治的骨幹，然後始能蔚成風氣，造成旋乾轉坤的力量。如果一個民族充滿了「人云亦云」的奴才，一個時代盡是「蠅營苟苟」的敗類，這個民族必然滅亡，這個時代必然黑暗。這一種認識和這一點警惕，是我們每個青年所必須牢牢牢把握住的！

其次我要談到政治能力的修養問題，所謂政治能力，包括學識，才三者，其中才的問題大半用兩個人的天賦，非可全靠人力造就，而學識，二者，則可以學問鑽研中得來。如果一個入有了豐富的學問和優越的識見，自然也就可以增高其才力了。近代政治有一種學術和制度的運用，沒有高深的學問，決不能做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尤其不能做一個革命的、治家。國父所講「革命的專使在深淵的學問」，真是對我們青年的當頭棒喝！青年們世未深，看事太易，每每看見一些入在政治上的偉德，便以為政治不過講背景和吹牛皮的勾當，用不着什麼學問，其實這是大錯而特錯的！我們要深切認識：治家與學問家是不能分開的，尤其在現在這個科學的羣衆的時代，沒有學識，根本不配過問政治；即算僥倖鑽進政治舞台，亦不過是尸位素餐的落伍份子，終久是要受時代淘汰的！我們願意喚起青年們把眼光放得遠大些，胸襟放得寬闊些，不要把一時的「治上人物」的得失看做「治的當應」，要做歷史上大政治家找榜樣，自己要有在歷史上創造地位的魄力！

末了，我還要勸青年們有政治家的風度。這個說起來似乎有點空洞，實際上，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一定是一個有政治風度的政治家。政治風度怎樣講呢？聽天籟，明大義，守大節，這是政治家的風度；不阿諛，不逢迎，不苟且，不欺騙，這是政治家的風度；不爭奪，不自私，不積威，不蓄權，這是政治家的風度。這些條件，要怎樣才能做到呢？這就我們平日的修養。中國政治哲學最重的一個「誠」字，總裁在政治的遺訓中說明「誠是修己治人的根本，一切事業的原動力」。我勸青年們要極力改正時下的浮滑虛偽習氣，要極力做「誠」字的工夫，只要我們能篤學力行，天下沒有打不成的困難和做不成的事業！我們所謂政治風度，其精義便是一個「誠」字。

在這篇短交裏，我向青年們提出了政治思想，政治現狀，和政治修養這三個問題，我的意見是很平常的，而我的態度却是十二分誠懇的。青年中國正在變遷的過程，我們大家都是青年，願以「青年」的綽號，彼此互勉！

# 論民主集權

高傳珠

總理區別權能的目的，在建設一個民主集權的政治制度。高先生這篇文章說明這種制度不僅適合政治的本質及建國的需要，而且也順應現代政治的趨勢；有理論，有事實，乃一精心之作。高先生現任職中央黨部。

高傳珠

政治解決民生問題的手段，離開民生，我們便不能瞭解現代政治的本質。所謂民生，是廣義的，係指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而言。廣義的民生，包括三個基本要素：經濟、教育、與武力。政治是改善人民生活、維持社會生存、充實國民生計、保障羣衆生命的手段。總裁說：現代國家的生命力有三：第一是教育，第二是經濟，第三是武力。所以現代國家的政治，應以發展國民經濟、普及國民教育、充實國家武力爲其目的；而政治本身乃爲實現這目的的手段。今日的教育，應與國防相配合起來，成爲國防教育。所以簡單言之，政治的本質，是國防和民生；政治手段，國防民生是目的。

但我們不要因爲政治是手段，就不重視他；因爲手段不完備，便不能達到我們建國的目的。建設之首要在民生，設其健全的政治機構，和有有效的政治管理，則人民的生活就不能積極的改善；社會的生存就不能妥善的維持；國民的生計就不能真正的充裕；羣衆的生命也就不能確實的保障了。

我們明瞭政治的本質以後，便可進而說明中國需要何種政治。明白些說，中國需要集權政治，還需要多方制衡的民主政治呢？此地所說的「民主政治」，係指上次歐戰以前歐美主要民主國家所遵守的民主原則和採取的政治制度而言。近來這些國家，迫於國計民生的實際需要，已在慢慢修正這些原則，而僅保持民主政治的形式；自然不是此地所指的民主政治的意思。國內有許多學者尚昧於歐美近年來的政治動向，和我們中國的眼前環境，希冀仿行歐美各國在上次歐戰以前所行的民主政治。但我們放眼以觀國家的實際情形，認爲我們實在沒有仿行那種民主政治（與民權主義不同）之可

能，反之，却只有實行民主集權政治的必要。所謂民主集權的政治，與極權政治，全能政治，相異。治均不同，萬不能混爲一談。民主集權，不但是一個革命政黨的組織原則，而且將成爲一個最健全最有效果的治原。俄國雖在揚言實行民主政治，實則俄國現在的治就是民主集權的政治。就某種意義說來，義大利現在所行的，也就是這樣的一種政治。這種政治的基本精神，在諮詢要普遍，行動要集中。諮詢不普遍，不能收集思廣益之效；行動不集中，不能獲事半功倍之功。

我們知道：現在歐美各國家的外交，國防、經濟、治安等，都需要迅速慎密的處理；若想做這一步，就非集權於政府及其領袖不可。至於一切落後的國家，若想做這一步，就非集權於政府及其領袖不可。至於一切落後的國家，若想做這一步，就非集權於政府及其領袖不可。更非有集權的政府不爲功。自歐戰以後，許多國家的政治，都表現這種趨向。但民主集權政治，應有他的限度；若政府把集權成份無限的擴大，便有變成極權政治或全能政治的危險。

以上係說明幾個基本觀念。現在可再較詳盡地分析中國爲什麼需要民主集權政治。

第一，我國抗戰以後，困難仍多，最基本的任務有二：（一）造成鞏固的國防，以保障國家主權的完整。（二）完成革命的建設，以解決全國國民的生活。欲貫徹這兩個任務，須有整個的國防計劃及推行這類計劃的有力政府和領袖。並非如此，則關於國計民生的一切建設，就很容易被黨派鬥爭所阻礙，被舊有的勢力所破壞，而不能按預定方針進行。若因政治糾紛而建設落後，則危險一發生，便不能應付了。此次歐戰法國之慘敗，以



# 價值觀念的顛倒

李長之

所謂價值，是會高下的。不論高下，就與價值無關。美和善都是價值觀念，所以也只有或高下論之。可是我看到許多價值觀念顛倒的例：

第一是以歷史的先後為價值有無的。中國的老子與耶穌同屬之。老子處處推崇「無」而貶抑「有」，這只因爲或歷史的眼光看，無在先而有在後，於是覺得無在上而有在下了。其實這如何可查呢？歷史的先後，是事理之自然的發展而已，這並不是價值輕重。常人之泥古而非今者，是價值觀念的顛倒；從而加以哲學化，以一「無」不如「有」如老子的，也是價值觀念的顛倒。即持進化論者，以爲後必勝前者，也還是價值觀念的顛倒。三代的銅器，後人絕不離棄；希臘的雕刻，後人能比美歐；晉人的書法，後人能超越；盛唐的律詩，後人詠歎不止；可見泥古而非今固非，主後必勝前者亦未必是。價值的輕重，原不該與歷史的範圍混淆，尤不該以彼代此。

第二是只以心理的建易爲價值的有無的。創作家與批評家的意見之相左者往往在此。創作家往往以「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者爲佳，因爲他有自己的艱辛在。可是批評家並不著眼在此的，倘要「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實這二者都是價值觀念的顛倒。心理上的難易並不是客觀上美惡的所在，「難」也可以有高下的別，「易」也可以有

美惡之分。心理的難與價值輕重殊途，既殊途，所以也或不能代之。只是俗人不察，往往費力不討好，所以便「隨人」多作怪了。

第三是只效用的有無爲價值的有無的。目前大部分的人陷在這個價值觀念的顛倒中。真正價值，無論善也好，美也好，係於自身，而不係於它的效用。倘若論效用，則刀可以雕刻，也可以切菜，還可以殺人，刀的價值將如何定規呢？刀是如此，一切事也可類推。倘若就效用論價值，必至抹殺價值。牛頓看蘋果落地有什末用？瓦特看發熱被沸水騰起有什末用？他們還是編譯觀照，就像一個畫家觀照一個飛鳥或一棵枯樹而已。目的在觀照，價值亦即在觀照本身。爲觀照而觀照，爲藝術而藝術，爲學問而學問，爲愛而愛，爲善而善，爲美而美；無所爲，爲事情本身而不爲事情之附帶效用這就是價值世界的特點。至於說由此而產生效用，那是另一件事。抱發現萬有引律的野心的人，不會靜靜地觀照蘋果落地的，所以結果也不會發現萬有引律。抱發明蒸汽機的野心的人，也不會靜靜地觀照沸水壺的燙的；所以結果也不會發明蒸汽機。眼光太近了，就不會看得遠；太執着於效用不效用了，精神遂不得馳騁而自由。「忘欲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宇宙間偏有這種辨證法！

第四是以描述事實的名詞而妄附以價值的意義

，遂造成無中生有的虛幻的價值。按照價值觀念的構成，往往先由描述特殊事物，進而構成共相；最後即變而爲一價值範疇。例如君子小人之別，原來只是階級的劃分，可是久而久之，即成爲兩種人性之分野，最後即變爲其一「係裝，其另一係貶了。初盛中晚，原是一個朝代的時間之劃分，慢慢便移表了四種作風，慢慢便又有了高下的價值之別了。一切價值觀念的構成，原都如此。只是所可注意者，倘若在這構成的過程中，參加上不經意的成分，或者故意的歪曲的成分，就會構成虛幻的價值觀念，換言之，即以只圖說明事實者而誤以爲價值於在內，結果造成價值觀念的顛倒。例如立學一詞，原係譯的西文的 *Method*，原不過指像諸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之後的文稿中的那樣問題之意，這只一說明的範疇而已，並非一價值範疇。但因輸入中國時，中國的哲學知識方在幼稚，遂巧又在「人生觀與科學」的論戰中，一方故意以立學冒充詆詞，所以這名詞在一般人心目中遂成一價值範疇，當說某某帶有立學色彩時，便不啻天下了一道罪孽深重的判決。浪漫的觀念亦然，唯心的觀念亦然。西人說，一點的知識，危險的，真的，觀的價值觀念一成，是非便無從立了。「必也正名乎」！我現在了解這話的痛切。

總之，價值世界是獨立的，自足的，所以不該以效用世界編之；價值世界是純粹的，絕對的，所以不能以心理的或歷史的事項代之；價值世界只論高下的，所以不能以本無價值的事實說明，或錯誤的虛構價值遮掩之。要價值者應爲價值之解釋而設

# 小烹集

虞紹

一治大國若烹小鮮！——莊子！

(一)

中國向以農業立國，農村社會是主靜的，所以在社會方面表現的是「老死不相往來」，在政治上表現的是「花落誰家歸誰」——做官吏的在這種環境中自然而是趨於緩情詩酒。自從鴉片烟戰後，海禁大開，不但外來的經濟侵略，使安閑的中國農村社會無法抵抗，就連中國幾千百年社會的本身組織，也不期然而然的變質了！

昆蟲當變化的期間，不知要受幾許的痛苦，何況一個國家，何況一個閉關自守，唯我獨尊久而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中國在這個變遷期間感覺着混亂，苦悶，這是當然的，也用不着灰心，更用不着性急。我們只應努力去尋覓病源，努力去追求光明。病源找不着，光明是不會實現的；病源找着了，因而不去設法醫治，剷除，光明也是不會來臨的。

抗戰以來，人們因為急求勝利，每每對中國現在的政治，表示責難；這種責難是祈求勝利早臨的動機，我們相信政府當局也一定原諒。不過責難政府的人，大多數犯了籠統，不落實際等等毛病，所以責難的話，並不能據着實處，因此也不得善政府當局的重視，更得不著深知中國政治的專家們同情。於是這種責難所發生的力量就不能宏大，更說不上成為改革中國政治的動力。

(二)

我個人主張：在今日的中國，政治之必須改進，這是不成問題的；在求改進的期間，不應「諱疾忌醫」，這也不成問題的，但是談中國政治改進的人，不要存一個「隔岸觀火」的心理，不要希冀「一躍而登泰山」之不可能；政府方面應心求政治之道，讀政治者有「割股治疾」的熱誠，然後病源或許可以剷斷得正確，光明或許降臨得快些。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也許非腐當局的人，不知改進的困難，艱苦。但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智者千慮，必必有一失」，又安知，「愚者千慮，一沒有得一得呢！謹本此情，作「小烹集」！

(三)

民國紀元以前，中央地方政治的機構相差不甚懸殊，中央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地方（州縣）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雖然部與房的組織大小繁簡不可比例，但是究竟上邊有什麼？下層更有什麼？況且那時是農村社會，愈接近農村，愈感覺着簡單，樸素，開通。中央方面，有許多廟堂儀式，遠比較地方麻煩些。自從海禁閉後，中央感覺應付外國的困難，逐漸的為適應計，添了許多機關，如總理衙門，（即外部的前身）如稅務司等，但是同時各省也隨着設立了洋務局，海關道之類的官吏衙門

一四

；不滿那時滿清政府腐敗，改革政治沒有具體計劃，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沒有收什麼效果，但是其上下聯貫，決沒有只顧上層，忘了下層。

民國成立之後，歐美治制度，大量移植到中國來；但是移植來的，只到了中央，沒有上下相桿的到底下去，這有兩種原因，一是新的人才不夠分配，地方財力不濟，不能贖幾許機關。二是政令不能統一，各省軍閥割據，人自為政，你講統一，他講獨立，中央無力推行其政令，更談不到干涉於他。地方與中央政治機構，各各的，彼此不相伴。到了民國二十年後，中央政府雖然逐漸有統一的力量，但是一則地方經濟人才不足適應，二則日本怕中國統一，國運興隆，發動九一八，弄得中國應付十分艱苦，因此，中國政治改進，始終成了一個上重下輕，上新下舊的情形，就像一個八人上非常健全，但是兩足軟弱無力，不足以支持其上體是一樣的。我們看中央五院幾十個部會，都是各種行政機關，計劃，法令，規章，多得叫人頭疼，但是我們再向地方看看，實際負執行責任的是誰？他沒有執行這種種政務的能力？我們真感覺到惶惑。有人說：中央許多機關，聚集了不少的專家設計，起草，又經過了無數會議的討論決定，於是部會呈報，院准再發部，部即咨省，省再令廳，廳令督察專員，專員令縣，縣令區署，區署令聯保，聯保通知保甲，也有至聯保為止，即進入字紙變的，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央就可許多好的計劃，又有什麼用呢？中國一個縣等於歐美一個小國，然而專門負行政責任的不到三五十個人，錢每月不過三二千元，最基本的行政細胞——保甲每月許多地

方每保存政府費具有一塊錢。有人作詩聯說保甲笑話：「管教藝術四件事，衣食住行一塊錢」，真正幽盡中國行政機構之奇態。

我們在中央看見每一件事，都要經過專家研究，都有專一的該管機關管理，但是我們到地方去看，什麼天大的事，都一咕嚕交給極少數稍識之無的所謂「科員」、「辦事員」去糊裏糊塗處理。有人說：中國行政機構是一個倒金字塔形，上面龐大無倫，下邊尖削得可怕。又有八說：中國一切行政機構的樹立都是在沙堆上建築百層大廈，只求這大廈宏偉的輝煌，考究而建築師設計時，根本忘了打地基這樣一類的大部工作。話雖說得也許過火一點，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行政機構的下層太薄弱了，太沒有基礎了。

### (三)

本來一個古老的國家要「變法」，這是漸進的，在那裏發生不適應而去改革那裏，愈是有悠久的歷史，高度的文化，「變法」愈覺困難。中國的固有文化，比日本高得不知若干倍，所以中國變起法來也不如比日本困難了若干倍。除了高度文化的國家，新取得荒野不毛的殖民地，他可以依照他母國的文物制度，整個有計劃地移植到殖民地來以外，此外一切文物的改革，都祇是比較滲透的，而方式多半是滲和的，修正的。固有文化低落，則滲和外來的成份多，修正的地方少，而進步也似乎快些。固有文化越高，滲和的成份愈少，要滲和多，也要一次一次的來，不能強硬的注入，如果富者不

知輕重，硬要一次注入，其結果便要發生強大的反感，弄得前功盡棄，中國戊戌成變，便是光緒與康梁等欲施行硬注入的「變法」，所獲得反動。日本明治維新變法之所以比較容易，原因是日本本身無所謂文化，日本過去的典章制度，都是學中國，一旦棄置效華而去效歐美，這在他們習慣上的反應少，自然面然效也比較容易些。

中國固有的典章制度都完備，平時以「天子大國」自居，他自覺他的這一套行了數千年都很好，外來的辦法，他不認為與古聖先王不伴，不宜於中國，就是拿破崙會，認為這是古已有之，硬給他一件不合身的中國外衣穿上，弄得非牛非馬四不像，如果行之而有弊，或為人指摘，則將計就計，算在「變法」，或「維新」，「改進」的賬上。他絕不說一件不稱身的衣服穿壞了，他硬說：這件衣物本身要不得，要了會中毒。多數人也莫明其妙的一以耳代目，鑿起非之，中國政治的制度改革，一再失敗，這般頑固自傲的人們，不能不多負一點責任。這次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失敗之因素一。

其次中國人，自從唐宋以文章取士以後，養成一種「脆弱」的民族性，不管理文，都只想用取巧的方法，用些好聽的文章，「名辭」粉飾像煞有介事，不但絕對沒有秦皇漢武萬里長城的氣魄，就連隋陽帝開運河的勇氣也沒有，遇事都只顧眼前，誰也不作百年大計打算。於是政治界弄成了一個粉飾政策的風氣，誰也不願意打算肩起築地基這種艱苦工作。今天這樣制度，明天那樣制度，都是些換招牌，改名稱的玩意兒。平良心講：中國政治界中，除了極少的人以外，有幾個認真

的「公忠體國」。有些他們本身見識不到，不知措置要如何才妥當？有些硬中了歐西「功利」主義的毒，認為這費力大而成功少的事，「不容易即身見功效的事，他們便明知之而怕去做。於是一個國家典章制度最大的改革，許多最基本的困難的事，誰也不去做，所以弄到今天，還是在沙堆上建築百層大廈。他們何嘗不知道這種做危險，但是他們怕在打地基。這是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失敗的因素二。

一個有文化的國家，容納外國的制度典章是逐漸的，是修正的；固然我們不能說「俟河之清」之呆候，我們要逐漸的去注入；我們不能歪曲事實，「變質」的去遷就一切，但也不應該盲目的在「削足納履」。中國政治改進，壞在這般不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歐美留學生們也不少，他們震於歐美的政治，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想生吞活剝的搬到中國來，他們忘了，「江南之橘，移植北化為枳」的故事，弄得一二次碰壁，結果影響到整個政治改革的進步。我相信這人謀不藏，決不是中國政治具有不可改進性的。然而這却不能不算上中國政治改革失敗的第三因素。

### (四)

政治最大的作用在管理，管理的基本是機構的調整，運用的藝術；如人之有心臟百腦，五官四肢，然後自然而然的能做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人沒有心臟不可以，具有多數的心臟也不可以。人不可沒有五官，五官都變成了變份，而且前後對立，這個四肢，也無法應付。心臟五官固然要緊，但

具有心臟五官而缺乏四肢，或是四肢健全，而心臟也變成廢物。其此：一個人具有自心願而五官，而四肢的官能，方成爲一個康健活潑的人，一個國家政治組織，自然也應具有康健活潑的組織，方能成爲一個強健國家。中國近代的政治組織，至少還是一個組織未能合理，未能康健活潑的現象。上重下輕也！重床疊屋也！配置不通也！運用呆滯也！

有一於此，皆無法自贖於富強之國，何況我們這四種毛病都犯；我們應該不「揀疾忌醫」，應該有一聲疾呼，壯士斷腕，的決心與精神，我們應該努力打破這一切一切的艱苦困難；我們要在抗戰期間，建起一個近代化國家應有的制度。我們不應該讓敵人來支配，不應該怕過着什麼壓力，我們只應該問：中國是不是只要有一個近代化組織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是不是應該在抗戰期間，同時將他建設？如果是的話，應該的話，我們便應舉國一致努力於此，去研究，去實現。

(五)

政治組織的原則，應該是單純、專一、敏捷，最忌的是牽連到彼此互相牽制，零碎到責任不專案，難到阻礙發生。我們爲求何以中國政治制度會演變到這地步呢？就我粗淺的觀察所得，是種因於下：一、專制，即：設一機關管理某事，因所任匪人，又不願意任事，於是再來一個同類的機關。甲機關應王督的事，但以該機關組織不良，不能負責，乃加設一個新的機關，而甲機關對於某一類業務的專

仍然保留，日久成了一個可笑的「遺形物」。某甲在政治運用方面不便長久令其冷落，又無現成相當位置，乃於某一機關中，任便分出一部分業務而置大之，設一新的機關，以位置此位置之人。因此結果弄成許多事沒有人管，同時又有許多事大家爭着管。沒有人管固然要不得，許多人爭着管一種事又何嘗要得。於是今天增設甲機關，明天又設乙機關，後天再擴充丙機關，這種舉棋不定的現象，根據於政治上的需要成份少，而根據於選就人事的成份很多。中國政治不能走上軌道，爲人設事的風氣，不能說不負多少責任。

我們覺得要中國政治走上軌道，第一個條件是調整政治機構：要單純，不要重床疊屋；要專一，不要互相牽掣，要做活，不要繁瑣不靈。要因事設官，不要因人設事。人不相宜，應該更換負責的人，職掌不明，要劃分明顯，權力不列，應該擴大他的權權。總之要站在事的立場來調整，不要站在人的立場來談運用。這是唯一無二的法門。第二個條件是合理化，我們應該設八荒，不能只顧及一部份，尤忌有輕重太過的毛病。我們不應只用力在一部份，而不想到顧到其他的部份，像「國今日，中央組織過度繁雜，地方這繁簡頗得可憐，快上下不能因應適合。第三個條件是多：基本上工作，少做些表面好看的玩意。譬如：我們應該努力去設置真的負責調查統計的機構或人員，不要只管弄一些不住的數字，在那裏畫出許多好看而無用的圖表。我們相信統計之可貴在數字的真確性。而在圖表畫得好看不好看。總而言之：我們希望中國政治非

出些腳踏實地個子，不希望出些好高騖遠大而無實的內容。

上面所說的話：我相信都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決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你要好有我們的政治組織，是不難逐漸健全起來的。

特刊

曾託哀草

清王應奎柳南園筆載：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備道任公瑛督兵以險以待之，其子遣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衛，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寇洩毒，多少百性不得安甯，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唯託哀草，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相痛，後來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啖定芳蘭，大家成此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囑之，不必多說。兒輩英雄人生自有定數，孽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常樂首，亦奚勝一黨哉。」此書載臨江李朝成庵老人漫筆，翻覆屢讀公之祖也。